



卓越学术文库

唐代文学与竹林七贤

TANGDAI WENXUE YU ZHULIN QIXIAN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刘小兵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唐代文学与竹林七贤

TANGDAI WENXUE YU ZHULIN QIXIAN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刘小兵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 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文学与竹林七贤/刘小兵编著.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6. 11
(卓越学术文库)
ISBN 978-7-5645-3593-3

I. ①唐… II. ①刘… III. ①竹林七贤-关系-中国
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唐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0860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 张功员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新乡市豫北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 787 mm×1 092 mm 1/16

印张: 17.5

字数: 336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 450052

发行电话: 0371-66966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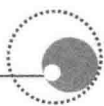
印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45-3593-3

定价: 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调换

对“竹林”文学传统的思考



(代序)

唐人朱湾《七贤庙》诗云：“常慕晋高士，放心日沈冥。湛然对一壺，土木为我形。下马访陈迹，披榛诣荒庭。相看两不言，犹谓醉未醒。长啸或可拟，幽琴难再听。同心不共世，空见薜门青。”诗中的“长啸”“幽琴”等，是对魏晋之际“竹林七贤”人生品格与生活态度的向慕，也是一段隔代的追寻与记忆。而这种记忆构成的一种集体化相承相续的联系，为“竹林”的经典化书写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值得强调的是，“竹林”作为特定的文化符号，当与“七贤”之群体兴起的特定时代有关，因为面对这一或称“高士”或称“名士”群体的兴起，切不可忘记其中“文学”的参与。换言之，正是处于个体化文人的大量出现而在某种程度上标明文学“自觉”之时，这一群体才以“文学”展示和记录了自己，后代又更多地以“文学”方式表达追慕情怀，于是成就了历史上罕与媲美的名士化的“竹林”文学传统。这传统又不仅仅属于历史，而是在“异代不同时”的接受与彰显中，呈现出每一时段的“现代性”。]

名士·文士：“竹林”文学之成立

“竹”作为意象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得甚早，《诗经·小雅·斯干》“如竹苞矣”、《楚辞·山鬼》有“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已写到竹与竹林，而将“竹”与个体化的文人生活结合在一起，则是在东汉时期。如仲长统《乐志论》描写的“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的情景，被称为“仲长园”，其中“竹木”也是怡情自然的重要因素。固然，如前引《楚辞》与仲长统之说，“竹”的意象已具有了“比德”的成分，然与魏晋之际之“七贤”以“竹林”为充满诗意的“符号”，而呈现其人格与生活，并成就其一种集体化的“文学”形象相比，则尚有一段审美距离。因为在“七贤”时代，“竹林之游”在人们的记忆中，已与人生与文学融为一体。这种最初的记忆首先呈现于作为“七贤”之一的向秀的文学作品《思旧赋》中，如其赋序谓“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

妙”“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这既是人生伤逝的感怀，也是“竹林”纪事的文学创造。再看《世说新语·伤逝》中，王戎有关“黄公酒垆”触景生情的记述：“王浚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这则故事之所以引起后世迭起赓续的共鸣，不仅在时过境迁的伤怀，而且内含了某种人同其情的感动，是文心与诗意的传递。

从这种记忆看“竹林”文学之成立，关键在于这一名士集团钟情于“文学”之转捩。试从三方面做些说明：其一，从文学背景看“竹林”文士。考原中国古代文学之兴，《诗》三百篇肇始，然属采、献而来，诚无名氏之为，最早有名姓者为战国两汉辞赋作家，然在西汉之世赋家的群体兴起，先来自诸侯王战国养士遗风，如梁孝王之“菟园”文宴，后成之于武、宣之世宫廷“言语侍从”之设。对此，班固《两都赋序》云：“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其时文学虽有追奉《诗》之风雅颂而与“三代同风”之盛，然均囿于献赋制度，而缺少文学创作的个性化色彩。迨至东汉，随着宫廷言语侍从地位的衰落，私有化庄园经济的兴起，才出现了诸如前引“仲长园”类的文学怡情现象。钱穆《读文选》认为：“文苑立传，事始东京，至是乃有所谓文人者出现。有文人，斯有文人之文。文人之文之特征，在其无意于施用。其至者，则仅以个人自我作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抒写性灵，歌唱情感，不复以世用纓怀。”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现了汉末到魏晋之际诸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具有文人化创作的文学集团。相比之下，被誉之“邺水朱华”而围绕“三曹”的“七子”或更多世用，其创作尚有侯王养士遗风，后世追奉的“竹林之游”的“七贤”，则处于或依附或游离政治权力中心的形态，而其人格的锤炼与文学的趋新，却更多的是“不复以世用纓怀”的志趣。这既是汉晋文学大背景的历史走向，也可印证“竹林七贤”的文学创造。

其二，从文学创造看“竹林”情怀。唐人李涉《葺夷陵幽居》诗云：“负郭依山一径深，万竿如束翠沉沉。从来爱物多成癖，辛苦移家为竹林。”这是唐人对竹林情怀的向慕，其中的“爱物”与“移家”颇中其心与怀之结穴。考察七贤中人，并非皆能超脱政事与俗务，如山涛之“仕”与王戎之“俗”，就曾引起当时及后世的歧义，即如借酒避世的阮籍，其撰《乐论》也极重政治功用，所谓“宾飨之诗，称礼让之则；百姓化其善，异俗服其德”“达道之化者可与审乐，好音之声者不足与论律”。只是在仕隐雅俗之间，七贤中人多选择一种

混冥与游离的心态,保持一种人格的相对独立性。而这种心态落实于文学创造,正是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一则“爱物”,以游离于政事,其钟情于物的背后,则是“玄风”独煽的人生。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如果说汉人论物多以宏大书写来“比德”,则魏晋中人尤好寄目微细,探寻物性,诚所谓“类有微而可以喻大”(张华《鹪鹩赋序》),也就是郭象注《庄》所言“大小虽殊,逍遥一也”。《晋书·向秀传》记载:“(秀)清悟有远识……雅好老、庄之学……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谈之者超然心悟。”读七贤诗文,如阮籍《清思赋》“飘摇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皎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璠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游物寄玄,“癖”中自有深意。二则“移家”,即心灵的安顿,再由内而外,成就其“雅致”与“清远”的品格。如以嵇康诗为例,其《酒会诗》有云:“流咏兰池,和声激朗。……倾味修身,惠音遗响。钟期不存,我志谁赏。”“兰池”与“竹林”只是不同物态或符号的同一旨趣,其流咏与赏志,才是竹林文学的真谛所在。

其三,从文学追忆看“竹林”风采。唐代史臣在《晋书》中有段评“七贤”之语:“嵇、阮竹林之会,刘、毕芳樽之友,驰骋庄门,排登李室。若夫仪天布宪,百官从轨,经礼之外,弃而不存。是以帝尧纵许由于埃壚之表,光武舍子陵于潺湲之瀨,松萝低举,用以优贤,岩水澄华,兹焉赐隐;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于嵇康遗巨源之书,阮氏创先生之传,军谲散发,吏部盗樽,岂以世疾名流,兹焉自垢?临锻灶而不回,登广武而长叹,则嵇琴绝响,阮气徒存。通其旁径,必凋风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轨躅之外,或有可观者焉。咸能符契情灵,各敦终始,怆神交于晚笛,或相思而动驾。”其中所述“嵇、阮竹林之会”“嵇康遗巨源之书,阮氏创先生之传”、嵇康的“临锻灶而不回”、阮籍的“登广武而长叹”,以及“嵇琴绝响,阮气徒存”“怆神交于晚笛,或相思而动驾”,已不限于史家的话题,而成为后世文学创作不断摹写的故事原型和精神意趣。这一点又可通过后代摹写“七贤”的追忆与想象,在成就作为历史化的“竹林”文学的同时,也因其创造而构建其经典化意义。

追忆·想象:“竹林”经典之构建

如果说向秀、王戎的思旧与“酒垆”属于当朝的记忆,则后世异代之人对七贤的摹写已然为追记,是通过语言符号(有关七贤事迹与七贤的文学创作)来接受并表达的。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唐代是最接近竹林七贤的历史阶段,也是最具有自由挥洒、个性狂谲的诗意的时代,所以“竹林”文学的经典化正是通过唐人文学的追忆与想象而完成的。先看李白《献从叔当涂宰阳

冰》诗中所述：“顾惭青云器，谬奉玉樽倾。山阳五百年，绿竹忽再荣。高歌振林木，大笑喧雷霆。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吐辞又炳焕，五色罗华星。秀句满江国，高才挹天庭。宰邑艰难时，浮云空古城。居人若薙草，扫地无纤茎。惠泽及飞走，农夫尽归耕。广汉水万里，长流玉琴声。雅颂播吴越，还如泰阶平。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各拔五色毛，意重泰山轻。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长叹即归路，临川空屏营。”其中“山阳五百年，绿竹忽再荣”是对“竹林之游”的追忆，而其后的自我发挥却充满了现实的甘苦与历史的想象。荷兰学者佛克马、蚁布思为经典形成的界定，就包括“反复地言说”这一要素（参见佛克马、蚁布思著，俞国强译《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白诗中所说的“绿竹忽再荣”，既是诗人对历史上之“竹林之游”的现实参与，也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反复言说的心态。

于是检阅李白等唐代诗人创作对“竹林”文学的反复言说，成为咏竹诗文中的“七贤想象”，且从诸多方面展开。如“林下之游”，岑参《潼关使院怀王七季友》诗云“不负林中期，终当出尘网”；如“山阳之竹”，刘长卿《同郭参谋咏崔仆射淮南节度使厅前竹》诗云“湘浦何年变，山阳几处残”；如“阮家之会”，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其一）诗云“今日竹林宴，我家贤侍郎。三杯容小阮，醉后发清狂”；如“叔夜风采”，陈陶《竹十一首》（其一）诗云“须题内史琅玕坞，几醉山阳瑟瑟村。剩养万茎将扫俗，莫教凡鸟闹云门”；如“竹林啸歌”，包融《阮公啸台》诗云“荒台森荆杞，蒙笼无上路。传是古人迹，阮公长啸处。至今清风来，时时动林树”；如“琴酒之趣”，王绩《独酌》诗云“浮生知几日，无状逐空名。不如多酿酒，时向竹林倾”，正是这种群体的追忆与想象，在形成经典话语的同时也成就了文学史的经典。

经典的形成既是一种复制，也是一种重构，“七贤”的群体性经典也常在个体性经典影像中得以凸显。例如，唐人诗文中的“嵇康形象”就是一个典型。其一，龙章凤姿的名士风度，是唐人追慕嵇康的形象。据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载：“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刘孝标注引《康别传》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有此天質，方有其器識。唐僖宗《授鄭從諲河東節度使制》謂“嵇松磊落，長標構厦之姿；和璧溫良，克表如虹之氣”，可窺一斑。其二，唯樂琴樽的个体自适，是唐人追慕嵇康的生存情态。这源自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自叙：“今但欲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

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意毕矣。”王绩《田家三首》(其一)云:“阮籍生涯懒,嵇康意气疏。相逢一醉饱,独坐数行书。”以意气疏喻示琴樽乐,在历史的记忆中参融了文学的想象。其三,千里命驾的契翁交游,是唐人追慕嵇康的挚情与魅力。据《晋书》本传,嵇康“胸怀所寄,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这一“千里命驾”之空间距离的泯会,还引发了唐人“千年契翁”之时间距离的协同,使“道契神交”的典范不仅属于历史,也是现实情怀的再阐。如李白《赠饶阳张司户燧》诗云“慕蔺岂曩古,攀嵇是当年”;《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诗云“访戴昔未偶,寻嵇此相得”;《赠崔侍郎》诗云“不取回舟兴,而来命驾寻”,心灵之投契,略无扞格。其四,目送归鸿的潇洒人生,是唐人追慕嵇康的恬淡怀抱与象外之意。“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乃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其十四)中的诗句,对此,清人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谈“晋人佳句”时以为“嵇语妙在象外”,“读者当以神会,庶几遇之”,堪称妙评。《晋书·顾恺之传》载:“恺之每重嵇康四言诗,因为之图,恒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正是这种难以复制或再现的意境神韵,唐人诗中为之反复咏叹,如司空曙《送曹同椅》诗云“中散诗传画,将军扇续书”;唐彦谦《秋晚高楼》诗云“高楼瞪目归鸿远,始信嵇康欲画难”,是在图像与语象间书写了一种想象的意境。

诚然,“嵇康记忆”只是后人承传而追奉的个案,但对“竹林”意义之追寻却不无启迪。

风雅·逸韵:“竹林”意义之追寻

如果回到历史的本真,竹林七贤并不是一个情致尽同的整体,而是在仕与隐、雅与俗、狂与狷之间呈现出不同的选择与不同的走向,然而在后人文学作品的追摹中,“竹林”又往往成为一特定的语言符号,寄托了特有的情蕴,且以风雅的气质、潇洒的人生与高逸的韵致,成就其对“竹林”意义的追寻。

仍以唐代为例,在其大量诗文吟赞七贤风雅、逸韵时,尚有一突出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对当朝人“盖棺论定”的墓志中常引七贤为范,其中尤以嵇康的“雅志”与阮籍的“清远”(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嵇志清峻,阮旨遥深”)作为人生书写的高标。先观嵇“志”的风雅,如谓“有叔夜之风,长松肃肃”(《大唐故处士吴君墓志》);“慕嵇夜之孤风,追许由之绝轨”(《大唐逸人焦君墓志铭并序》);“每以琴书取乐,用启荣期之欢;文酒自贻,方给嵇康之

志”(《唐故归州兴山县丞皇甫君墓志铭并序》);“陶陶然有嵇君之雅志,侃侃然有颜回之独乐”(《大唐故右卫翊卫吏部常选宁府君墓志铭并序》);“罇酒不空,得文举之深置;鸣琴流引,叶叔夜之幽栖”(《唐故始州黄安县丞尚君墓志铭并序》);“嵇康逸士,方得志于烟霞”(《唐故怀州河内县丞李府君墓志铭并序》);“马融长笛,对竹径以吟龙;叔夜鸣琴,坐梧庭而下风”(《唐故冀州南宮县尉邢君墓志铭并序》);等等,其对墓主风神、气质的描绘,“嵇志”或可视为魏晋风度的代词。再看阮“旨”的清远,如谓“阮嗣宗之材器,参亚府僚;刘公干之词锋,才堪比况”(《唐故游击将军信义府右果毅都尉韩公墓志铭》);“通阮籍优游于步兵,庄周放旷于园吏”(《唐故支君墓志铭并序》);“俪嗣宗之竹径”(《唐故右戎卫翊卫徐君墓志铭并序》);“皎皎犹白鹤之冠群飞,肃肃类青松之标灌木。……虽复步兵去位,何以尚之”(《唐故邓州司仓张君墓志铭并序》);等等,也同于“嵇志”,是对竹林人生的再现。正因如此,嵇、阮合璧,也成为唐代评人铭志的惯例,如谓“一丘一壑,素琴浊酒,庄惠之临濠上,嵇阮之封山阳”(《郑故处士王君墓志》);“志尚清虚,托巢由之放旷;情敦淡泊,访嵇阮之招携”(《唐故公孙君墓志铭并序》);“追何石之高踪,慕嵇阮之雅致”(《大唐故张君墓志之铭并序》)。“嵇琴阮啸”,正在素琴浊酒、情敦淡泊之间,而托情之际,又何尝没有现实的风华与志趣?七贤风雅,竹林逸韵,在历史的升坠间被人们反复地言说,不断地影写,其文学创造中的文化意义何在?这又牵涉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经典的树立往往是一种“纠正”,构建高标是为拯救沉沦,文学的创造与文学的研究均当作如是观。

由此,我想就“竹林”意义提出三点思考:

思考之一,雅正情怀与雅文学传统。我国自《诗》“六义”的倡导,已彰显了雅颂的文学传统,迨至班固《两都赋序》称颂汉人献赋为“雅颂之亚”,可知其所言雅颂属于宫廷文学的歌功颂德。而被后世推尊的七贤之“雅致”则不相同,是东汉文人化文学崛起后的人生毓养,是文明气质与高逸品格的礼赞。这种雅正情怀,撑起中国雅文学传统的精神。然而这种情怀被追寻的前提,却是来自双重的挑战:一为宫廷御用文学(如唐以后仍占主导地位的“翰苑”文学)所挤压,谄媚文风的华美与空疏,在无形销蚀与戕害文学气质、风骨时,人们对“竹林”的追慕与想象甚至重构,自然隐蕴了这层在可言说和不可言说间的深意。二为民间俗文学的冲击,这在宋代兴起的“瓦弄”讲唱及元人曲词中的“嘲圣”与对名士“虚伪”的贬斥,已多呈现,“清高”常常成为嘲弄的对象而非神圣的向往。尤其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漫长的时段,中国文学处于救亡与济贫之际,不仅宫廷的雅颂文学失落,而且个性化的雅正文学也遭忽略。而当批判文学呈示暴力,民俗文学流于低俗,中国形象与中国文明的呼唤也不限于“政治”与“旅游”,“竹林”文学的意义与再阐宜为

警醒。

思考之二,著我精神与个性化创造。中国是个制度化极强的国家,个人极为渺小,正因如此,竹林诸贤以其棱角分明的个性化色彩,受到后世文人的极力推崇,其中的甘苦除了“士不遇”的情怀,更多的是对自由的向往。清代诗人袁枚倡导独抒“性灵”,其中最重要的是“著我”精神,而文学创作与研究,失去自我就没有创造,更谈不上什么“原创”,结果只是文字的堆砌和历史的复制。先父允臧教授在1936年写《我我歌》有云:“我也我固我,我及我之同;人亦我其我,更我我之躬。混合分解无非我,独体之我互爱勿交冲。……不使大我损毫末,健全小我大我自成功。”没有“小我”(个性),何来“大我”(共性),竹林之“我”与后人追寻之“我”,既是孤星独耀,也是传统链接;当文学(包括研究)成为制度化的产物或规定性(如工程、项目)的附庸,苍白的学术病容不能不引起现实中人对竹林“自我”的怀想、追寻。

思考之三,艺术人生与文学的研究。在人们反复地追忆与复述“嵇琴”“阮啸”及“千里命驾”“目送归鸿”的影像中,彰显的无非是艺术化的人生。自唐宋以后科举考“文”以来,当今学子写作论文工具化、模式化的“时风”日甚,对七贤的向慕之情弥切或许正意味着某种“缺失”。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将人生划为五种境界,分别是功利、伦理、政治、学术与宗教,而在学术(真)、宗教(神)之间,所谓“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的才是艺术境界(美)。没有艺术的人生,何来艺术的创造、艺术的研究、艺术的享受?当文学成为追名逐利的工具,文学研究“流为历史考据学的附庸”(拙编《桐城文选·前言》),对七贤雅正、竹林逸韵的赞美,自有其推陈出新的价值与意义。

小兵的博士论文《唐代文学与竹林七贤》,以文献充足而丰其理据,以作品分析而观其发明,以专题研究以见其思考,而尤以辞章之美彰显其诗性与才情。他以心、以文、以情来写这篇文章,所以在答辩时受到评委“文学化”的赞誉。时逾数载,文稿经作者修改锤炼,将刊行以嘉惠学林,并嘱为序。因思杜公诗“自闻茅屋趣,只想竹林眠”,以及《杜臆》所解“山云涧水,即所闻茅屋趣也,因此想竹林之眠,犹二阮之把臂入林耳”,故从小兵文中抽绎文献,摹其文采,而为几点发挥,也算是同声相应吧!

许 结

2015年3月书于金陵



绪论	1
第一章 竹林七贤故事在唐代的传播与接受概述	5
第一节 历史记忆:从《晋书》看唐代史家对竹林七贤故事的记述	6
第二节 文学记忆:唐代类书对竹林七贤故事的传播作用	9
第三节 童年记忆:从《蒙求》看唐人对七贤事迹的接受与传播	13
第二章 唐人对竹林七贤的集体追忆	18
第一节 “山阳”:唐人追忆七贤的符号	19
第二节 “竹林犹在”:唐人墓志中的七贤追忆	27
第三章 七贤的诗性与才情在唐代的嗣响	47
第一节 “奏嵇康之琴”:嵇琴流出的唐音	48
第二节 “阮氏逸韵”:阮啸在唐代的回响	57
第三节 “阮咸牌”琵琶在唐代的发现	67
第四章 仕与隐:不同的时代,共同的歌哭	75
第一节 “何事懒于嵇叔夜”:唐人对“嵇康之懒”的接受	76
第二节 从竹林之隐到“大隐隐朝市”:阮籍之隐对唐人的启示	84
第三节 重风神,也重功名:唐人对“山公之启”的价值认同	94
第四节 褒贬不一:唐人眼中的王戎之“俗”	99
第五章 “从来爱物多成癖,辛苦移家为竹林”:唐人与竹林	107
第一节 竹林清风:唐人的咏竹诗文与“七贤想象”	108
第二节 白居易的“恋竹”情结与魏晋追寻	127
第六章 “我师嵇叔夜”:唐代文学与嵇康	136
第一节 “更师嵇叔夜”:唐人诗文中的“嵇康记忆”	137

第二节 “卧看中散论”:唐人对嵇康散文的接受	149
第七章 从正始之音到大唐歌者:唐人对阮籍《咏怀》诗 的接受 ..	160
第一节 “咏怀”范式的继承与开拓	162
第二节 “宗庄”“祖骚”“续雅”的接力	170
第三节 经典意象及经典句式的接受	173
第八章 “酒神精神”的传承:唐人对刘伶及其《酒德颂》 的接受 ..	184
第一节 唐人对“酒圣”刘伶的追忆与效法	185
第二节 游于醉乡的傲世者:“五斗先生”王绩	196
第三节 酒以全身的闲情人:“醉吟先生”白居易	205
第九章 “怀旧空吟闻笛赋”:唐人对《思旧赋》 的接受	214
第一节 “邻人思旧情”:使事用典	215
第二节 “更赋山阳笛”:另赋新篇	224
结语	236
附录:“正始之音”考辨	239
参考文献	254
后记	266

绪 论

竹林七贤,作为魏晋之际一道奇异绚烂的文化景观,作为名士风度的典范,不断地受到后世文人学者的青睐。今之治哲学史、思想史者,探究其竹林玄学;治艺术史、美学史者,心仪其魏晋风度;治文学与诗学者,则倾心其正始之音。虽角度不同,然对七贤关注的热情却是同一的。因之,学界关于竹林七贤的研究成果在不断的积累当中。唐代更因其所创造的灿烂辉煌的文化,使得“大唐神韵”同样令人心仪神往。唐代文学一直就是古典文学研究的重镇,其成就已硕果累累更无须赘言。其中,对于唐代文学繁荣兴盛之源的探讨,也在进一步深入与加强之中。

然而,在有关竹林七贤的研究领域,成果多集中在七贤本身的思想与文学成就之发掘上,论及七贤之影响,一般也仅限于阮籍、嵇康二人;而将竹林七贤作为一个名士群体,深入而全面考察其对后世的影响,此类成果至今未见。故而,从整体上进行竹林七贤的接受研究,无疑可以拓展关于七贤研究的领域。同时,将竹林七贤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与唐代文学之间的联系,则无疑又可以细化与深化对唐代文学繁荣兴盛之源的探究。

笔者认为,竹林七贤作为一代名士群体,作为“魏晋风度”的典范,对后代之士人精神与文学创作皆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书尝试从影响和接受的角度,从士人心态史、文学史的传承流变的高度,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探寻大唐神韵与竹林七贤之间曾经有着怎样的关联,综合考察唐代文学与竹林七贤之间存在的某些历史性关联,努力将唐代文学对七贤的接受研究落到实处。

一、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本书所要考察的主要对象是“唐代文学与竹林七贤”,着重探讨唐代士人的精神气质中有多少受到过七贤所代表的“竹林精神”的影响,并进而影



响到文学创作;同时,唐代文学又对由七贤所创造的“竹林文学”,有过哪些方面的接受。

“七贤”之称,最早见于《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①七贤并非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其个性才情、思想倾向、价值取向实有所差异,最后的命运亦各不相同。然而,在历史的瞬间,他们走到了一起,后人更将他们并称。因此,七贤既是一个名士群体,又各自有着鲜明个性特征。

竹林七贤留给后世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是他们共同代表的“竹林精神”与共同创作的“竹林文学”,二者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个性特色。其中,“竹林精神”与魏晋玄学密不可分,其实质是魏晋玄学浸润下的士人思想心态的表现,其总体上的精神气质体现为反对种种外在的压抑与束缚,看重个体生命的自适与逍遥;相对于强调道德礼法的儒家思想,七贤所代表的“竹林精神”无疑更倾向于老庄之道。在行为做派上则因人而异,又可具体展示为不问世事、怡情养性、琴酒吟啸、清谈雅集、纵情放诞、服食修仙等。七贤虽非人人皆有作品传世,但还是留下许多堪称经典的文字,如《咏怀诗》《绝交书》《酒德颂》《思旧赋》等,共同组成一道“竹林文学”的风景线。“竹林文学”的突出特征则是“师心”“使气”、情理兼重、超尘越俗;总体而言,乃是一种着力抒写自我、不重事功的文学,敢于质疑与反思、师心独见的文学。

魏晋文学之“建安”与“竹林”,前后相接,却又相映成趣:前者偏重于外在功业的建树,代表的是士人兼济的事功精神;后者侧重于自我心灵的安顿,代表的是士人独善与逍遥的情怀。二者之文学史地位及其影响是否可以等量齐观,自可见仁见智;然而,数千年来儒家功利主义的诗学观念,实际上导致了古今文论家对“竹林精神”及“竹林文学”之影响的漠视。然而,翻检唐人的文献史料,笔者发现,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学,甚至在墓志这样的应用文体之中,唐人关于竹林七贤的记忆与想象却是那样的丰富多彩。梳理唐代文学与竹林七贤之间的历史渊源,无疑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学术命题。对唐代文学之七贤接受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唐代士人情怀的体悟,加深对唐代文学风貌的理解,以及对唐代文学之渊源的探究,也有助于对竹林七贤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开拓。而当我们将对二者的观照,置于数千年之士人精神传统以及数千年之文学传统的历史长河中时,此论题则更彰显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

^①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陈乃乾校点:《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6页。



二、研究策略与论述框架

在今存七贤之史料有限的情况下,不去纠缠学界曾热衷于探讨的有关“竹林七贤”之“真实性”问题,而是将竹林七贤视为后人的一种“文化记忆”。这种记忆,既是历史的又是想象的,是一种渗透着后人合理想象的历史与文化记忆。所谓的“竹林七贤”,起初或许只是几个文士在历史的瞬间偶然的雅集,但是在后世的传说与“记忆”中,却不断地被加工重构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士人精神的一种载体;它承载的既是魏晋易代之际部分士人的精神底蕴,更是各个不同时代士人对自身命运的认同与期待。

首先,对于唐前的七贤接受予以一定的观照并做简略梳理。因为唐人的七贤接受必然是在前人对七贤的传播与接受之基础上进行的。故而部分章节在展开论述唐人的七贤接受之前,亦略述唐前的七贤接受情形。

其次,对于唐代文学,则借助其文献相对丰富的优势,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前提下,从文献文本出发,去探寻和总结规律。论述过程中,注重文献自身的价值,强调“文本细读”的功夫,而不做太多的主观臆断,不炫耀似是而非的时髦理论。故而论文征引了大量的与“唐人的七贤记忆与想象”有关的文献资料,用文献“说话”,从而不使自己的论题沦为主观的“想象”。例如,论文将文学研究界关注不多的墓志铭也纳入研究视野,如《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及其续编,尤其是后者篇幅甚巨,然由于其对本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从阅读、摘录、归纳、总结,耗时近两个月,从5000多条唐人墓志中辑得百余条与七贤有关材料,从而为“唐人的七贤追忆”增添了较有说服力的证据。

全书的主要研究思路是将竹林七贤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观照其共同的“竹林精神”在唐代的被“接受”;同时,凸现七贤各自独特的才情气质及其在唐代的嗣响。例如,“山阳之会”“竹林”是七贤共同留给唐人的记忆;在“仕与隐”的问题上,七贤同样给唐人以思考与启示;而“嵇琴”“阮啸”“阮咸”“山公之启”等,则是七贤个人风采及其在唐代的回应;至于《咏怀诗》《绝交书》《酒德颂》《思旧赋》等既是竹林文学的组成部分,更是七贤留给后人极具个性特色的经典之作。总之,在唐代士人的精神气质与竹林七贤的风采神韵之间,在唐代文学与竹林文学之间,努力探寻其间的传承与流变。

全书共分九章,如此设置论述框架,是基于点与面的兼顾、总与分的结合。

第一至五章有综论的性质,侧重于“竹林精神”的传承。文章选取了几个不同的角度:第一章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概述七贤留给唐人的丰厚的“记忆”;第二章从唐人诗文用典“山阳”及墓志铭的角度,考察“唐人对竹林



七贤的集体追忆”；第三、四、五章分别从“七贤之诗性与才情在唐代嗣响”“仕与隐”及“竹文化”的角度，综合考察唐人与七贤在才情气质上的遥相呼应，在必然要共同面对的人生问题上的继续思考，以及“竹林”这一富于文化意蕴的“象征物”在唐人的七贤接受中所起的作用。

第六至九章则有分论的性质，侧重于“竹林文学”在唐代的流变。分别论述了唐人对嵇康散文、阮籍《咏怀诗》、刘伶《酒德颂》、向秀《思旧赋》的接受。然其中亦有综论之处：如第六章第一节综论“唐人诗文中的‘嵇康记忆’”，第八章第一节综论“唐人对‘酒圣’刘伶的追忆与效法”。在全面观照、综合论述唐人之七贤接受的同时，许多章节中亦不乏针对唐人的个案研究：如第二章第一节重点关注了李德裕的“山阳”情怀，第四章第二节重点关注了王勃、杜甫、李商隐对阮籍“穷途恸哭”的接受，第八章第二节与第三节，则分别以王绩和白居易为个案，考察了唐人对刘伶及其《酒德颂》的接受。

从“接受”的角度研究古典文学已有可观的成果，但笔者无意效法当前流行的“接受史”系列的写作思路，更无意用自己的研究对象，刻意去印证西学之相关理论。在酌情借鉴他山理论之“玉”、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力求师心独见，使自己的理论方法、论述结构不落他人窠臼。此外，为契合自己的研究对象——魏晋风度及大唐神韵，论述语言上亦回避学术八股之枯燥乏味。凡此等等，皆为作者所努力追求之目标。其间得失，自当求见于方家达士。

第一章

竹林七贤故事在唐代的传播与接受概述



竹林七贤,这七位魏晋之际的风流名士,之所以能够与数百年之后的唐代文学产生瓜葛,与七贤的故事早已在唐前及唐代的广泛传播密不可分。“竹林七贤”,犹如一瓮好酒,经过了六朝的酝酿,至唐代散发出更加诱人的芬芳;由七贤打造的“魏晋风度”,以及由七贤创造的“竹林文学”,皆受到了唐人的青睐。因此,竹林七贤不仅仅是唐人的历史与文化记忆,也是唐人的文学记忆。简略梳理唐人关于竹林七贤“记忆”的来龙去脉,了解竹林七贤如何成为唐代士人心目中之偶像的大致情形,是展开“唐代文学与竹林七贤”这一论题的必要基础与前提。

七贤事迹与诗文在唐前的主要传播渠道以及接受情况大致如下:

一是史书、笔记小说。如从魏晋风流之记录的《世说新语》及其相关注本来看,不仅可见竹林七贤早在六朝已经成为士人心目中的偶像,亦可知七贤事迹的主要传播载体还当包括唐前诸家《晋书》、七贤之别传等^①,只是其中许多文献原书今已不存,但是从《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的著录情况看,有些书在唐代是一直流传的,如戴逵的《竹林七贤论》、孟仲晖的《七贤传》、袁宏的《名士传》等^②;又如裴注《三国志》,其中引《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

① 如《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多次征引七贤诸人的所谓“别传”,以及王隐、虞预、臧荣绪等诸家《晋书》。

② 《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76页;《旧唐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02页。